

省电力局，直至1992年底退休。接着又受聘于电力部、国家能源投资公司驻上海地区大型电力设备制造厂总代表组，任浙江首席代表。继续发挥余热八年，直至2000年完全休息。这时已是“九五”末期。回想起来，我从“一五”到“九五”，基本上达到“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昔日的年轻小伙，如今已满头银发，跨入“80后”的行列。几十年来，无论在平原还是山区，在内地还是沿海，爬高山、进溶洞，登上100多米的烟囱，

四五十米高的锅炉；无论在机组紧张施工阶段，还是最后72小时的整套机组试运连续作战，我从未感到身体不适或因病休假。这都应归功于学校对劳卫制锻炼的严格要求，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结果。

光阴荏苒，六十年一甲子，弹指一挥间。重温当年在清华园的美好时光，我们不能忘记母校的精心培养和恩师们的谆谆教诲。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清华，我成长的摇篮，我永远爱你！

## 探索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之路

○傅正泰（1954 水利）

1954年，我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工结构专业，留校担任理论力学基础课教学工作，之后在清华工作了整整30个春秋。1984年，我离开清华创办了海淀走读大学。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清华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学风，以及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深深溶入到我的灵魂之中，影响了我一生的教学、研究和办学实践。



1988年5月，傅正泰校长（左1）和返校毕业生在双榆树校区欢聚

我一生酷爱教育事业。在清华早期的教学活动中，我曾总结清华上世纪60年代的教学经验，写出论文《萃取精华精通精华》，不仅发表在清华《教育通讯》创刊号上，还得到蒋南翔校长的大力支持，在清华校内交流推广。

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但国家确有困难，原因有二：第一，国家经济困难，拿不出更多钱来发展高等教育；第二，大学生都是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国家经济规模总量小，没有那么多的专业岗位，政府担心毕业生多了不好就业，怕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西方国家战后经济发展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重视教育。美国的大学生比例很高且不说，日本、韩国每10万人口已有大学生2500—3000人，而中国每10万人口大学生只有200—300人，只有少数精英才

## □ 值年园地

能上大学。民族素质存在如此大的差距,我们民族将来如何参与世界各民族的竞争呢?我下决心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之路,希望为提高我国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今天称之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创造一个可借鉴的典型。针对国家的困难,做了以下四件事情:

### 创办民办大学,探索高等教育 办学体制改革之路

8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是,国家既穷又包得太多(包学费、包生活、包就业)。国家负担太重,所以不能扩大招生规模,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形成强烈的反差。我想创办一所民办大学,打破高等教育由国家包办的局限,希望创造一个靠民间力量办大学的典型,带动高等学校办学体制改革。

当时教育部不承认民办大学的学历,几经周折,我们得到了海淀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协助下,以区办校助的名义申报成立了海淀走读大学(现北京城市学院)。海淀走读大学名义上是区办校助,实际上是民办公助——海淀走读大学的办学方式与公办高校完全不同,办学体制为“国家承认学历;学生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学校民办公助、自负盈亏、面向市场、自主办学。”这从根本上打破了高等教育由国家包办的局面。

学校内部体制方面:师资队伍是专职和兼职相结合;设备采用借用和自备相结合。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保证教学质量。这种办学体制灵活、负担轻、教育质量

好。在一无所有(无资金、无校舍、无设备、无专职教师)的情况下要创办民办大学,困难非常多。我靠借的五万块钱,借成府小学分校的小院白手起家,历尽磨难,在与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使海淀走读大学在高校林立的北京市站稳了脚跟。学校专业设置灵活,教学质量高,在高校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成为高等教育界的一朵奇葩。

### 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需要,突破 学科教育框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当时我国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学科教育,以不同学科划分系和专业,培养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此外我国的高等教育长期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学生专业理论懂得不少,但动手能力却很差。而具有多方面知识和较强动手能力(包括社会活动能力)的实用型人才却十分缺乏,出现了“许多人没事干,许多事没人干”的社会问题。

为了适应社会就业岗位对人才的需要,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

1.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向就业市场设置专业。比如,1984年我们学校创办之初就设置了秘书和实验技术等以职业为导向的专业。
2. 按照就业岗位的实际需求,开设相应的课程,安排教学计划并及时调整教学计划。
3. 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强课堂实验、顶岗实习、校园活动、社会活动,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等等。这些面向社会需要培养人才的举措原本是为了保证毕业生好就业,但无意中迈出了我们探索高等职业教育的最初步伐。

海淀走读大学经过多年在实践中的探索逐步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特征,并在实践中坚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方向。

我们的民办高等教育实践经验和探索高等职业教育的体会,有幸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支持。1996年9月国家教委决定,另拨招生指标(给海大600名),由海淀走读大学(民办)和北京联合大学(公办)试点高等职业教育。海淀走读大学三年“高等职业教育”试点工作取得了全面的成功。据北京市教委统计,1999年海淀走读大学首届“高等职业教育”试点的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7%。海淀走读大学是民办学校,又是专科,设施简陋,还要收学费,所以招收学生的分数在北京高校中是最低的,却达到这么高的就业率,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创新发展思路, 迎接高等教育大发展

我认为高等教育应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向高发展。培养有雄厚理论基础的精英人才,准备将来在各种重要岗位担当骨干和领导工作;另一个是向广发展。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有相当动手能力的实用型人才,在企事业第一线担当各种实际岗位工作。这个思想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1999年,教育部、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文件,要求在全国以“新机制、新模式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不仅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海淀走读大学多年来倡导和成功试点的方向,而且所谓“新机制、新模式”就是海淀走读大学的民办教育经验(国家

不包,学生缴费上学)。海淀走读大学的经验得到了肯定,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高等职业教育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很荣幸,在推动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中,我们做了一些有益的开拓工作。

另外,我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当然是培养实用型人才,但培养实用型人才不仅仅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任务,学科教育在吸收了某些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之后,也可以培养有自己特色的实用型人才。这也是解决社会急需实用型人才的另一途径。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突破口,使全国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1998年全国招生规模才108万,2004年就增加到了420万,现在全国每年毕业700多万人,真正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使许多青年有了不一样的前途,许多家庭有了不一样的命运。

借全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东风,北京城市学院(海淀走读大学)面向市场做大做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95年我校才招收300名学生,学校总人数不足千人,2008年我退休的时候,学校每年招收新生达7000多名,学校总规模达到两万多人。

### 狠抓教育质量,保证持续发展

质量是发展的根本,没有质量,发展就不能持续,就可能夭折,高等教育更是如此。在我创业之初,就非常明确这一点。

随着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学生质量却逐年下降,2004年的本科录取线只是1998年的专科录取线,而当年的专科录取线又降了100多分。许多人担心招了很多人,质量不高,毕业后不能就业可能引发新的

## □ 值年园地

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保证教育教学质量,使学生以专业技术扎实,动手能力强,作风正派,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2年保持在99%左右,领先全国和北京市高等学校。

2003年,教育部决定海淀走读大学升格为本科院校,更名为北京城市学院,这是对我们创办民办大学实践的客观肯定。北京城市学院升本以后,继续秉持“改革探索、勤奋进取、艰苦创业、开拓前进”的校训,一如既往,扬帆远航。2010年学校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育合格评估,2011年、2012年学校在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中国民办大学排行榜上连登榜首。

在我从教60周年,北京城市学院成立30周年之际,我很欣慰地看到,北京城市学院作为民办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仅以我的一些成绩,感谢清华对我的栽培和教育之恩。

2014年6月于北京

注:傅正泰教授,1984年9月创办海淀走读大学(现更名北京城市学院),是创校的第一任校长。被誉为探索民办大学办学体制的民办高校的先行者、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开拓者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领跑者。

## 昔日往事

### ——纪念清华毕业50周年

○ 蒋建民(1964电机)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当时尽管是动乱的战争年代,但家母对孩子们的学业仍十分重视,每搬迁到一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我们找个好学校。她老人家教诲我们:“艺多不压身”、“言必信、行必果”,这些格言影响了我的一生。1958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可以说这决定了我一生的轨迹,改变了我的命运。

入学之时正值“大跃进”高潮,处处都在大炼钢铁,校内各系各专业也都在大放“卫星”,到处是轰轰烈烈、群情激昂、挑灯夜战的场面。那时的食堂也是一天24小时开饭,随进随吃,还吃得很好。但没过太久,大约在1959年年初吧,食堂

就开始要餐券了。浮夸风造成粮食减产,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起了苦日子。

这段时期我本人的情绪是十分安定的,从未因为“吃”的问题影响到学习。相反,还因为学校的活动少了,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功课。记得我最常去的地方除图书馆之外就是北院教室和四院教室(现都已拆除),在这些小平房里我度过了不少难忘的时光。冬天放假时,来这里的学生不多,教室里有两个大铁炉子,室温虽不高,但阳光通过大大的玻璃窗户照进来,感觉暖烘烘的。到了1962年,国家的经济形势有了很大好转,学校提出“因材施教”等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我学习